



孔子儒家思想——中华文化的宝贵遗产(汤一介)

(2005-7-11 13:23:31)

作者：汤一介

在我国历史上儒、释、道三家并称，但三家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不同，儒家思想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体。从经典的体系来看，儒家所传承的“六经”，都是孔子以前已经形成的，这些经典是夏、商、周三代文明的精华；而孔子开创的儒家与先秦各家最大不同，就是儒家始终以自觉传承“六经”为己任，“六经”所代表的中国古代文化正是通过和依赖于儒家的世代努力而传承至今。由于儒家具有如此深厚的历史文化根源，由于儒家的积极入世的实践精神，由于儒家所具有的深厚历史感、文化感、道德感，由于儒家在传承历史文化上的自觉努力，它的价值观逐渐成为中国社会价值观的主流。儒家“德治爱民”的政治文化、“孝悌和亲”的伦理文化、“文质彬彬”的礼乐文化，“远神近人”的人本取向，渗透到中国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儒家哲学强调阴阳互补、和谐与永恒变易以及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成为中国古典哲学的重要基础。这些都深深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的哲学、宗教、伦理、文学、艺术、科技、医药以至政治、经济诸多方面，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中华文化的儒家思想对世界文化也产生过重要影响，而且还在产生越大的影响。早在公元一世纪就传入东亚地区的各个国家与民族，其后在日本、朝鲜、越南等国都产生过广泛的影响。到十七、八世纪后，孔子及儒家思想又影响了欧洲的思想界。德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 1883—1969)曾提出“轴心时代”的观念。他认为，在公元前五百年前后，在古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几乎同时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他们都对人类关切的问题提出了独到的看法。古希腊有赫拉克里特、苏格拉底、柏拉图，中国有孔子、老子，印度有释迦牟尼，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传统。这些文化传统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人类文化的主要精神财富，而且这些地域的不同文化，原来都是独立发展出来的，在当时并没有互相间的影响。雅氏又说：“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这就是说，中国思想文化的每一次飞跃都是在对儒家思想的重新回顾而取得的。儒家思想文化对东亚地区各国各民族一直有着重大影响，这是尽人皆知的，同样对欧洲文化产生过重大影响。中国文化的儒家思想早在一千多年前就通过丝绸之路传入欧洲，到十六、七世纪又经欧洲的耶稣会士介绍到欧洲各国，到十八世纪曾在那里掀起一股“孔子热”，当时人称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是欧洲的孔夫子，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思想家；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盛赞孔子及其学说，他认为中国社会有序，在道德政治方面大大超过西方。特别是1988年在法国巴黎召开的第一届诺贝尔获奖者大会上，诺贝尔物理学获奖者汉内斯·阿尔文博士(Dr. Hanes Aelven)在闭幕大会上说：“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个世纪以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

儒家思想文化曾在历史上对中国社会，也对世界各国各民族的社会发生过重大影响。那么对今天人类社会，以致将来人类社会能否还会有重大影响呢？我认为，孔子的儒家思想无疑仍会对当今、甚至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都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我们知道当今人类社会面临最大问题是“和平与发展”问题。这就是说，当今人类社会要生存和发展必须要实现“和平共处”，即要解决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扩而大之就是要解决好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地域与地域之间的关系。儒家的“仁学”可以为这方面提供有价值的资源。人类要“共同发展”，就不仅要解决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还要解决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儒家的“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可以为这方面提供十分有意义的资源。

儒家的“仁学”为协调“人与人”（包括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地域与地域）之间的关系提供宝贵的有价值的资源《郭店竹简·性自命出》中说：“道始于情”。这里的“道”说的是“人道”，即人与人的关系的原则，或者说社会关系的原则，和“天道”不同，“天道”是指自然界的运行原则或宇宙的运行原则。人与人的关系是从感情开始建立的，这正是孔子“仁学”的基本出发点。孔子的弟子樊迟问“仁”，孔子回答说：“爱人”。这种“爱人”的思想从何而有呢？《中庸》引孔子的话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仁爱”的精神是人自身所具有的，而爱自己的亲人最根本。但是“仁”的精神不能只停止于此，《郭店竹简》中说：“亲而笃之，爱也；爱父，其继之爱人，

仁也。”非常爱自己的亲人，这只是爱，爱自己的父亲，再扩大到爱别人，这才叫作“仁”。“孝之放，爱天下之民”。对父母的孝顺要放大到爱天下的老百姓。这就是说，孔子的“仁学”是要由“亲亲”扩大到“仁民”，也就是说要“推己及人”，要作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才叫作“仁”。作到“推己及人”并不容易，必须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恕之道”作为“为仁”的准则。

（朱熹《四书集注》：“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如果要把“仁”推广到整个社会，这就是孔子说的：“克己复礼曰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其由人乎？”自古以来把“克己”和“复礼”解释为两个平行的方面，我认为这不是对“克己复礼”的好的解释。所谓“克己复礼曰仁”是说，只有在“克己”的基础上的“复礼”才叫作“仁”。费孝通先生对此也有一解释，他说：“克己才能复礼，复礼是取得进入社会、成为一个社会人的必要条件。扬己和克己也许正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别的一个关键。”我认为这话是很有道理的。朱熹对“克己复礼曰仁”的解释说：“克，胜也。己，谓身之私欲也。复，反也。礼者，天理之节文也”云云。这就是说，要克服自己的私欲，以便之使合乎礼仪制度规范。“仁”是人自身内在的品德（“爱生于性”）；“礼”是规范人的行为的外在的礼仪制度，它的作用是为了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之和谐相处，“礼之用，和为贵”。要人们遵守礼仪制度必须是自觉的，出乎内在的“爱人”之心，才符合“仁”的要求，所以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对“仁”和“礼”的关系，孔子有非常明确的说法：“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没有仁爱之心的礼乐那是虚伪的，是为了骗人的。所以孔子认为，有了追求“仁”的自觉要求，并把这种“仁爱之心”按照一定的规范实现于日常社会之中，这样社会就会和谐安宁了，“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这种把追求“仁”的要求作为基础的思想实践于实际生活中，就是《中庸》中说的“极高明而道中庸”。“极高明”要求我们追求哲学上的最高原则，即“仁”；“道中庸”要求我们按照一定的规则（“中庸”：用中的意思，作到恰到好处，不偏不依，不过也不及）实现于日常生活中，而“极高明”和“道中庸”是不能分成两截。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最高理想“内圣外王之道”。中国传统认为只有道德人格最高尚的人（内圣）才宜于作“王”，而道德人格最高尚的人不能只是“独善其身”，而必须兼利天下，所以《大学》中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连成一个系列。我认为，孔子和儒家的这套思想，对于一个国家的“治国”者，对于现在世界上的那些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统治集团不能说是没有意义的。“治国、平天下”应该行“仁政”，行“王道”，不应该行“霸道”。

[\[第 1 页\]](#) [\[第 2 页\]](#) [\[第 3 页\]](#)

[\[关闭窗口\]](#)